第 一 篇 总 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温州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一制多式”的局面，即在社会基本制度相同的前提下，各个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格局。①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珠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而“温州模式”又因其独有的高度自发性特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温州是浙江省南部的一个地级市。全市面积 11783.5 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和山地分别占 17.5% 和 78.2%。由于历史上交通比较闭塞，区位条件较差，国家投资不足，自然资源也无特别明显的优势，1978 年以前温州市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是浙江省内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后，温州的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13.22 亿元迅速增长到 2000 年的 825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15.6%，由此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初步走出了一条通过率先市场化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新路子。

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国内学术界曾出现过几次颇具声势的研究热潮，从各个角度和各个层面深入研究了“温州模式”。为了全面总结“温州模式”的特点，本章将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概述“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征，回顾十几年来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进展和现状，并结合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近况，对“温州模式”的发展以及研究趋势作出进一步的展望。

① 于光远：《由温州模式谈到“一制多式”》，《大公报》1992 年 1 月 28 日。

一、定义、内涵与特征

“温州模式”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中，通过需求诱致型的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或者说，“温州模式”是温州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通过率先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①

“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温州模式”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模式；另一方面，“温州模式”也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或者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教授曾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将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的过程”；二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的过程”。② 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过程，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表现为资源从以农业为代表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即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二是资源在地域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表现为资源从广大分散的农村地区向城镇优势空间的集聚，即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过程。

从温州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来看，温州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区域内的人力资源——具有区域特色商业文化传统的各种经营人才。改革开放政策所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使得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其潜在的优势，温州人利用其善于捕捉经商机遇的优势迅速地完

①参见史晋川《“温州模式研究”开题报告》，载《国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温州模式研究”开题报告材料汇编》，温州师范学院 1999 年 4 月汇编。

②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很快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使以家庭工业起步的个体私营工商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及公司制和股份制企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利用专业市场的创建与迅猛发展，推动了以小城镇的兴起与迅速扩张为特征的城镇化进程。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分析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时曾经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① 诺斯教授所说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微观经济主体层面来看的经济组织，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厂商，例如个体户或工商企业；二是从社会经济制度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层面来看的经济组织，即社会经济生活中资源配置活动的方式，例如市场制度及市场的运行方式。

从温州经济体制变迁的实践过程来看，温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与扩张，同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或者说经济主体的民营化，形成了一种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生共荣的格局；二是以专业市场的蓬勃兴起与迅猛发展为契机，较快地形成了覆盖面较广的各类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民间金融市场），使得市场取代了指令性计划的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活动中的主要调节方式。

上述分析表明，“温州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质言之，“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字，即“两化”，“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利用了在体制外进行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迅速地推动了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由此造成了一种区域性的经济体制落差，并且借助经济体制落差的“势能”，迅速地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形成了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②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关于“温州模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将依照两条主线加以展开：一是“温州模式”经济发展的主线，二是“温州模式”制度变迁的主线。此外，为了使研究更具系统性，整个论述的展开还将辅之

① 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②史晋川：《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 3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其他两个研究角度：一是有关人文精神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二是海外学者的视角。前者主要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后者则主要是一种在国际视野中的比较研究。

二、区域经济发展角度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推广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农村劳动力开始不断向制造业和商业流通领域转移。在温州，当时以农村家庭工业为特点的农村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使得温州经济飞速发展。到 1985 年 4 月，温州家庭工业已达 13.3 万户。大批农民走上富裕之路，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万元户”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85 年 5 月 12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记者桑晋泉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 33 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第一次在媒体上正式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并且把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同时许多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到温州考察，许多著名的学者也在赴温州实地调研后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和研究“温州模式”。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马洪（1985）对温州乐清县的万元户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充分肯定了万元户在农村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① 费孝通（1986）把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② 吴象（1986）则把温州经济的基本特色概括为“其基础是农民经营的家庭工业，其纽带是以农民购销员为骨干的专业市场，其依托是主要由农民集资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小城镇”③。董辅礽等学者（1986）尽管没有直接提“温州模式”，但也对温州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充分的肯定。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还

① 马洪：《乐清县万元户情况的调查》，《农村工作通讯》1985 年第 9 期。

②费孝通：《温州行》，《瞭望》1986 年第 20～22 期。

③吴象：《论发展中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人民日报》1986 年 8 月 6 日。

④董辅礽、赵人伟等：《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经济研究》1986 年第 6 期。

专门成立了课题组对温州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在 1987 年出版了《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浙江本地的学者张仁寿则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一直对“温州模式”进行全面、系统的跟踪研究，他与李红合著的《温州模式研究》（1990）是当时研究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本最为深刻和系统的经济学著作。

费孝通是最早关注温州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曾经三访温州，并前后在《瞭望》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所产生的影响最大。费孝通在他的文章中首次形象地把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并指出，从这一特点看，“温州模式”已超过了区域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发展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① 在这里，“小商品、大市场”是对温州产品结构和商品流通方式最形象直观的概括，而“以商带工”则是对温州经济发展中用市场化带动工业化这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高度概括。但是，当时人们在研究“温州模式”时大多比较重视温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问题，而对于温州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仍缺乏深入的探讨。

董辅礽、赵人伟则把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他们认为，温州成功的经验是：第一，以家庭或联户为经营单位的民办工业同那些通常是由农村各级政权机关主持兴办的乡镇企业相比，具有自己的某些长处：在经营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经营成果与生产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有利于高度发挥从业者的积极性 设备少，投资小，上马快，容易办起来 可以利用农民家庭房屋，因陋就简进行生产，因而成本低，资金利润率高；生产技术简单易学，扩散很快 企业小，掉头快 等等。第二，把拾遗补缺或填补市场的空隙作为生产经营的方向，有利于争得并保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第三，由专业市场和遍布全国的购销员构成的商品流通网络，在推动、调节和组织民办工业生产上起了显著的作用。

最早研究“温州模式”的著作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恩桢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该书把“温州模式”的内涵概括为：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促使农村致富。至于“温州模式”的产生，他们借用当地干部群众的话

①费孝通：《温州行》，《瞭望》1986 年第 20～22 期。

来说,是‘放’出来;‘逼’出来;‘创’出来和‘扶’出来的。① 此外,该书对温州市场化过程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对于温州的假、冒、骗现象,他们认为与其说是因商品经济发展而起,还不如说是与商品经济发展不足有关。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化,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并求得发展,势必会讲求自己的产品质量和维护自己的商业信誉。而且,当时某些机关、企业中所出现的一些反常情况,如为了获取一点个人微利而让公家买进大量劣质商品而蒙受损失等,也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而消失。

张仁寿和李红在《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中指出:“温州模式”如同‘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一样,主要是一种农村地区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该书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他们认为:“温州模式”的产生与发展,是现实的与历史的、内在的与外在的、客观的与主观的等一系列相互交错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地看,“温州模式”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在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呈现出人多地少的矛盾时,由于地理位置(附近没有较大的城市群)限制、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和社队企业基础差,以及国家投资极少,家庭工业成了温州发展商品经济、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问题的必然选择;第二,具有经商区域文化传统的温州农民,通过商业活动和经营性劳务等各种渠道,不仅提高了劳动技能,增长了见识,掌握了技术,而且也迅速地进行了家庭工业初始资金的积累;第三,温州本地具有一个区域性的宽松的政策和舆论环境 第四,20 世纪 80 年代存在着对低档日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使得温州的家庭工业发展具备了有利的市场条件。② 《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一是由于主要作者是温州籍学者,所以可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许多重要的研究结论是通过深入观察经济活动和多层面、多角度分析后得出来的;二是尽管作者主要将‘温州模式’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来加以研究,但是,他们通过对所有制和企业制度、专业市场与市场体系等方面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区域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开始比较全面地涉及到了区域发展中的体制变迁问题;三是作者通过对农村工业化不同发

①袁恩桢主编:《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

② 详见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有关章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温州模式’较之于‘苏南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对于我国处于不发达状况的广大农村更具有典范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国内学术界主要是把“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来加以探讨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是温州经济的发展方式及其特征；有关“温州模式”产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体制或制度变迁问题，大多只是在研究“温州模式”的成因时才被涉及到，而并没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话题”来加以研究。之后,随着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温州模式”研究的“热点”开始转向了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制度变迁方面。

三、经济制度变迁角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温州模式”研究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同时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建立中国经济转型的过渡经济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从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角度来深入研究“温州模式”。马津龙(1993)在研究股份合作企业时，首次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来分析‘温州模式’的形成 张军(1997)则借用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理论研究了温州农村的民间金融市场结构，以及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水平和风险的关系；徐明华(1998)运用过渡经济学对温州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金祥荣(2000)则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较为全面地分析“温州模式”形成中的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式；杜润生(2000)应用自发次序理论来研究“温州模式”，认为温州经济是一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因而也是一种自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马津龙在“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研究”课题中，最早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概念研究“温州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企业制度演变问题。他认为，强制性变迁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和引发社会动荡，改革成本即制度转换的“交易费用”较高；而诱致性变迁则由于有一个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缓冲过程，因而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制

度变革形式。“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过程中通过诱致性变迁建立市场经济的一种典型形式。温州股份合作企业的形成，既是农民选择中经济取向和政治取向的二重复合，又是政府选择中经济取向和政治取向的共同结果。从农民选择中的经济取向来看：一方面，技术的不断进步要求企业迅速扩大投资规模，而股份合作制则比较有利于集中分散的资本；另一方面，政府的各项有关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的积累与分配的规定，也使股份合作企业比私营企业在经济上具有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如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本与归股东按股份共有的公积金，可以在税前列支股息，私营企业的自有资本却不能得到这笔收益；股份合作企业的实际所得税和贷款利率也低于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作为集体企业，可以在减免税优惠、获得土地使用权、评选先进、领取许可证等方面享有各种优惠待遇。从农民选择中的政治取向看，股份合作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法律上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它的发展不会受到当时政府政策的限制。相反，私营企业却时常会遇到存在合法性的危机问题。从政府选择中的经济取向来看，各级政府出于对经济建设的共识，谋求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政绩冲动，使它们在选择企业形式时产生了以经济取向为基准的明显倾向。由于温州国有、大集体企业基础薄弱，因而家庭企业及其发展形式也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霍布森选择”。从政府选择中的政治取向看，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温州国有、集体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始终使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上的难题。因此，引导一部分个体私营企业逐步向新型的具有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企业组织形式过渡，便成为温州政府部门的自觉选择。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温州农村普遍出现的以股份形式合伙经营的所谓“合股”企业，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温州政府部门在尊重个人财产权利的基础上，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对既存的合股企业逐步进行‘按股共有’的股份化改造和‘共同共有’的合作化规范。前者是通过监督建章立制，确立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建立有限责任制度；后者是通过建立归全体职工共同所有的公共积累制度来加以规范。根据马津龙的研究结论，股份合作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带有股份因素和合作因素的“混合经济”，其发展趋势是合作因素将逐渐减少，股份因素将渐趋增多。股份合作企业很可能将作为一种以股份制为基础，同时一定程度上带有合作制因素的普遍企业组织形式，而在我国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过程中长期存在。①

基于对温州民间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注，张军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研究了温州农村民间金融部门的结构演变及其性质和作用。他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他认为，农村信贷市场的分割，以及利率在非正规信贷部门能保持高于正规部门的稳定水平，是农户和农户组织（指家庭企业）对农村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风险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一种理性反应。无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还是在温州，民间的借贷最初都是从亲朋好友和邻里之间的借贷链扩展出去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履约问题在亲朋好友与邻里之间一般来说是不严重的，因此可以降低借贷的风险。在这种亲朋好友的信贷关系中，由于筛选问题不严重，所以借贷甚至常常是低息的和无息的。随着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家庭工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借贷关系链不断延伸与扩展，非正规的民间信贷作为一种市场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利率开始逐步发挥过滤及防范借贷风险的功能。因此，张军认为，在改革正规金融部门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而不是抑制农村非正规金融部门真正进入市场。与此同时，在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时，要放松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让其也能以独立的金融组织的角色进入市场。政府的角色只是对整个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规制，使之走向更加有序的竞争格局。②

徐明华把温州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放在一个过渡经济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认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完全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与方向，而且也符合市场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他分析“温州模式”的起点是人多地少，国家投资不足，温州的传统文化是讲究功利，重视工商；温州人富有吃苦耐劳、敢于冒险的精神因而，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展了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市场经营活动（“非法市场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非法市场化”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因此这种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寻求合法化保护。一方面，“非法市场化”的主体通过“戴红帽”的形式为自己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往往采取默许甚至公开支持的方式对市场化活动加

①马津龙：《温州市场经济与股份合作企业》，《温州论坛》1993 年增刊

② 张军：《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 年秋季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保护。在这一过程中，民间自主性创新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政府对于民间自主创新的导向性规范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整体上推动了温州经济市场化的扩展。市场化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关于市场制度的知识的扩散过程。温州具有较高的了解市场制度知识的人力资本存量，因而市场化能够由民间自主性创新推动，并且发展较快。同时，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的。改革成本不仅表现为由利益冲突所引致的摩擦成本，而且还表现为搜寻知识、学习新制度，为改革制度而重新签约的实施成本。不论是摩擦成本还是实施成本，都表现为改革的阻力。从初始条件对摩擦成本的影响看，因为温州人几乎没有得到计划经济的“计划内好处”，因而改革的推力较大，摩擦成本较小。从初始条件对实施成本的影响看，尽管温州实行新制度的改革成本很大，但是不改革则将面临生存危机，相比之下，较大的改革的实施成本是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同时，“温州模式”的发生与发展正是遵循了哈耶克所谓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是在计划外空间由自发的个体创新启动的。因此，只要上层决策者能理解和尊重群众的个体创新，并加以正确的引导，就可能建立起某种秩序，并使这种秩序能不断地扩展。①

金祥荣（2000）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从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的角度对“温州模式”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认为“温州模式”是在全国性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中，率先通过需求诱致型的局部制度变革所形成的浙江省乃至全国“制度创新”的一个“空间极点”。温州在全国率先通过体制外的制度创新，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建立起了以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的、明晰的和排他性的产权制度。与其他纯属政府强制性、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创新不同的是，“温州模式”是在自发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与政府推行的强制性供给主导型改革的制度博弈中形成的。“温州模式”在 20 年的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追求摩擦成本最小化的、以准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为主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从而给温州进而给浙江构筑了一种比全国其他区域产权效率更高的“体制落差”优势，推动了其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金祥荣提出，从区域性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阶段来看，温州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一次体制转变”），目前正处于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期，也即从产权制度变革到以管理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

①徐明华：《温州模式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兼论过渡经济学相关的几个问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 年第 3 期。

体制转变”。其中的重点是实现古典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这是企业与市场边界出现“革命”性替代变化的时期，要实现体制的阶段转变，就需要重点加强要素市场建设，改变传统的市场组织与市场交易方式，同时放松对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进入规制。因此，“温州模式”的成功表明，温州人民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低成本、高收益的改革道路，它能够适时实现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使得低效率产权结构中存在的所谓“诺斯悖论”得以被尽快消除或减少到最小范围。因而，与其他区域的经济模式相比较，“温州模式”对内陆省份以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更具有借鉴意义。①

赵伟在《温州力量》（1999）和《“温州模式”何去何从》（2000）这两篇论文中，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产权明晰，内源积累，区际贸易”，即其一是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其二是资本形成基本上完全依靠区域内老百姓的自我积累，其三是市场主要靠国内市场。同时，赵伟还指出，在温州由于财富主要掌握在私人及民营企业手中，政府支出主要来源于企业上交的税收，基层官员已经开始比较普遍地认识到，只有企业发展了，政府才能正常运转和发挥应有的职能，因此政府为企业服务的观念开始顺理成章起来。为了留住投资，保持经济繁荣，政府就得设法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而且，在这种区域环境中，乡镇政府要采取比较重大的决策，若不取得当地民营企业界的普遍认同就难以实施。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形成一种倒逼式的民主体制。此外，赵伟还指出，“温州模式”毕竟属于一种正在成长的区域工业化模式，目前已在诸如产业结构、产品档次、企业文化等方面显现出某些内在的缺陷。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次生的，只要模式本身能够不断扩展，就可以逐步克服这些内部缺陷。“温州模式”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来自外部，即中观层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其中金融体制和农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将可能直接制约这种模式的进一步发展。② 可以认为，在赵伟关于将温州的经济体制变迁与经济发展道路相结合的研究中，有关制度变迁的问题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体制层面，而且开始涉及到政治体制层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有关“温州模式”的经济体制变迁方面的研究具

①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② 赵伟：《温州力量》，《经济学消息报》1999 年 11 月 26 日；《“温州模式”何去何从》，《经济学消息报》2000 年 4 月 7 日。

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从具体的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例如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安排）逐渐扩展到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和变迁方式的研究；二是从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开始扩展到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变化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温州模式”的研究层面，同时也使研究得以深化。

四、人文精神透视

随着“温州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的迅速扩大和有关“温州模式”研究的深化，许多学者开始进一步认识到，温州经济的崛起，除了经济学分析所揭示的种种因素以外，事实上还与温州人具有区域特征的人文精神有着很大的关联。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仁寿等学者就已经论述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温州模式”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指出，温州代代相传的工商业传统，使温州人具有经营工商业的独特优势。同时，温州还有提倡“功利”、“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深深地受“瓯越文化”熏陶的温州人，“重义轻利”、“崇本抑末”等因袭包袱较轻，形成了较强的讲究功利、积极进取、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务实进取、敢于竞争的思想观念，注重发展工商业，具有吃苦耐劳、勤奋苦干的精神。这种文化传统，与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观念和精神相吻合，成为推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的精神力量。[①] 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也开始进一步认识到“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现象，而且更是特定区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经济社会现象，因此他们纷纷从社会学和人文精神角度，对温州人群体特征及其对温州模式产生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剖析。其中，周晓虹（1996）、项飚（1998）、王春光（1999）等专门研究了流动在外的温州人群体，尤其是北京的“浙江村”现象；王春光（1999）还研究了巴黎的温州人在当地社会的融入方式；李明欢（1999）则专门研究了温州人在欧洲的移民情况。王晓毅（1996）则通过对温州苍南钱库镇项东村的调查，比较研究了广东和温州两地乡村工业化发展对家族制度的影响。温州学者马津龙（1999）也对家族制问题及其对民营企业

① 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7页。

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温州当地的一些学者如朱康对（1997）、廖意如（1997）、蔡克骄（1999）、李庆鹏（1999）、陈中权（1999）、朱长丰（2000）等则对传统区域文化对温州人文精神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王晓毅通过对广东雁田村和温州项东村的比较研究指出，基层社会的农村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是一种地方小文化，这种地方小文化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作用，与其所处的更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关。在国家控制严密的地方，家族制度的作用受到抑制；反之，家族活动就可能比较活跃。改革前的温州，家族活动相对比其他地方活跃，但总体上是受到一定的制约的。农村改革以后，由于国家对家族活动的控制减弱，各地的家族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同时人们在发展经济中也开始较多地借助于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在项东村具体表现为家族式企业不断兴建，甚至第一家村办企业的建立也借助于族人的力量。但是此后该村的村办企业效益并不好，而村民的股份制企业发展则较快。随着村庄的开放程度提高和外来人口大量增加，村内比较富有的人户纷纷迁移到附近的小城镇上，与村庄的联系减弱。在这种发展状态中，围绕家庭，人们的亲属圈子在缩小，强化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关系密切的亲戚（如兄弟姐妹）为成员的经济共同体。农村工业化需要家族制度的支持，特别是在发展初期。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财产关系及组织形式的变化，家族制度所起的作用也就会有所不同。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农村工业化对中国家族制度的影响远比土地改革或人民公社的作用更大。①

朱康对在剖析“温州模式”的文化成因时认为，要充分把握温州乡村经济的发展脉搏，就必须深入剖析家文化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小商品生产方面，家庭生产方式有着大规模生产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一方面导致了集中性工业生产活动的分化，使之融入了分散化的家庭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又通过家庭间的分工与协作，把分散化的家庭生产功能整合成一定的区域集聚优势，从而降低了乡村社区整体交易成本，提高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所以，在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以小商品生产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工业构成了温州乡村经济的最主要特点。尽管目前温州地区拥有 3 万多个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在私营、股份合作企业基础上组建的为数不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企业集团，但其中许多仍难以抹去夫妻工厂、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的痕迹，家庭化、家族

①王晓毅：《家族制度与乡村工业发展——广东和温州两地农村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总第 16 期，第 5～14 页。

化的色彩仍旧十分浓厚。有的企业虽然从名称乃至形态上颇具现代气息，但其内在的运行管理机制仍旧是家庭企业的翻版，其发展从根本上还是依靠家庭和家族的内在聚合力。因此，这种建立在家庭本位主义文化基础上的家族制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虽然有着相当的特殊优势，但最终必然会因其自身的缺陷而阻碍进一步的发展。目前温州农村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规模优势，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有关企业急需突破家庭、家族观念的束缚，对自身实行彻底的制度创新，建立起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实现对小农家文化的超越。①

蔡克骄认为,温州人文精神是由温州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条件所决定的。历史上温州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商贸城市。温州人素有重商观念,重功利,务实际,恋家不守土,能随时调整自己,最大限度地去主动适应、顺应环境而求生存，以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去追求利益和发展。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温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受永嘉事功学说的影响，温州市民有较为独立的主体意识；受市民阶层价值观、消费观的影响，温州形成一种讲究排场的奢侈民俗 受手工业、商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温州人勤劳,不怕吃苦,相信‘ 民勤于力而以力胜 ”;有竞争意识,心灵手巧,讲信誉,对新事物有浓厚的兴趣,模仿、接受能力强 从事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经营的温州人还有较强的‘ 宁为鸡首,毋为牛后 ’的自主意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温州的人文精神还带有世俗化倾向。此外，诸如强者的心理结构、对宗族文化的崇尚、对生活的人道主义态度等，都对温州的人文精神形成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②

李庆鹏同样也比较侧重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温州的人文精神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当代温州商潮的涌起，与温州历史上发达的工商业传统即农商文化、移民文化、海洋文明及永嘉事功学派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借鉴“ 真理 ”(1987) 观点认为,瓯越文明的内质是一种以生存为前提的典型的‘ 农商文化 ”。就温州而言,历史上的感性文化,是典型的“ 农商文化 ”,历史上的理性文化则是‘ 永嘉学派 ’及其思想的传承。但从这两种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来看，古代感性文化对广大农民的影响更为明

①朱康对：《小农家文化与温州农村家庭经济》，《浙江社会科学》1997 年第 5 期,第 73～76 页。

②蔡克骄:《温州人文精神剖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第 28～31 页。

显。事实上，永嘉学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农商文化影响的结果。因此，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永嘉学派是农商文化的结晶；另一方面，永嘉学派的重商主义传统延续到今天并广泛地深入民间，构成了温州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永嘉学派对温州文化特别是温州人的经济意识的变革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大贡献是提出了新的义利观，第二大贡献是提出了工商皆本论，第三大贡献是肯定了雇佣价值观。①

王春光则进一步把温州人文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视野扩展到温州区域之外，深入研究了温州人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对温州人经济扩张能力的影响问题。他先后于 1993 年、1994 年、1997 年对北京的“浙江村”进行长时间的调查，于 1998 年 9 月到 1999 年 1 月对巴黎的“温州城”进行了 4 个月的调查。通过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深入研究分析后，王春光认为“温州模式”中的“大市场”，不仅仅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温州涌现的十大著名专业市场，而且包括撒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交往网络，也就是温州人的社会网络。他把区域社会网络作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关注温州人在流动、移民和融合过程中如何利用、更新和扩充社会网络，从而扩大温州人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影响。他发现，不论是北京“浙江村”的温州人，还是巴黎“温州城”中的温州人，从他们个人的综合素质来看，他们并没有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有更多的特殊性或优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差一些。但是，温州人为什么却能满世界流动做生意、办企业呢？原因是其中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配着温州人的流动和移民行为。温州人通过人际关系链流动和迁移出来，又聚集在一起。社会网络是温州人在他乡或别国生存、发展和融入的重要法宝和社会资本。对许多在北京“浙江村”和巴黎“温州城”的温州人来说，个人自身的资源相当有限，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更多的还是采用依赖族人和亲朋好友的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起他们的社会网络；或者说，这样的网络为他们在一个新环境的进入、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支撑，反过来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社会网络。他们的社会网络主要由族亲、朋友、乡邻三者编织而成，为他们的流动和迁移、非法存在、就业、融资及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了支持。总之，社会网络大大地有助于温州人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有了这样的网络，他们即使不懂当地社会的语言

①李庆鹏：《中国犹太人——神秘的温州人》，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1～9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